

# 赤子之心 报以国兴

## 不能遗忘的华侨抗战史

陈建新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国际地位低下,海外侨胞寄人篱下,孤立无援,生命财产处于毫无保障的境地。坎坷的道路和榛莽的生活,使海外华侨深深感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同他们息息相关;祖国的强弱存亡直接影响着他们在异国的处境。这也是海外爱国侨胞在近现代中国的变革和革命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孙中山说过:“中国革命,多依靠华侨的帮助。”他还为侨胞亲笔题写“华侨是革命之母”的匾额。时间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劫难,具有反帝爱国光荣传统的海外华侨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爱国高潮。

### 宣传造势: 最先大规模开展国际援华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惨遭日军蹂躏,身处海外的华侨也倍感屈辱。面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留美学生刘震东给天津《大公报》社寄来一封信,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是祖国“所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他沉痛地说:“有时我们怕在街上走,因为怕见人。假如中国是强国,我们可以自豪说我们是强国,文化最老国家的国民。但是,事实不让我们作如此想,我们只有恨我们自己不争气。为什么自己近年内战,国家人民的精力,整个耗费在军阀争权夺利之上?”刘震东的信道出了当时海外华侨的真实处境与心声,就连走街串巷卖报的侨童,也感到无颜见人。

1932年8月2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反战大会,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代表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群众多达1.5万人。不过中国国内没有直接派出代表与会,而是由欧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和德国华侨反战大会派出6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在大会上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事实,博得了与会者的认同,掌声经久不息。应该说,最先大规模地开展国际援华抗日活动是由海外华侨组织的。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对广大华侨来说,民族不在必失其“根”。正如有的侨胞所说:“倘若国破家亡了,我们海外的侨胞能不亡国奴吗?”

1938年5月9日,1.2万来自美国各地的华侨华人聚集纽约曼哈顿,在唐人街游行。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一天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署23周年日。为了让员工参加这场游行,曼哈顿的1500家中国洗衣店、餐馆和商店当天关门。游行队伍高举着横幅、蒋介石画像,100名穿着旗袍的华人女子,抬着一面长23米、宽14米的“中华民国”国旗参加游行。这次游行虽然没有要求捐款,但是沿途路人不断地主动向旗上抛硬币,从1美分到50美分,甚至纸币。在游行队伍上空,还有6架由华人机师驾驶的飞机,他们正在罗斯福机场学习飞行,准备回国参战……所过之处,外人驻足观看,华侨华人热血沸腾。

这年夏天,芝加哥5000多名华侨华人高唱雄壮的抗日歌曲,走上街头游行,宣传中国抗日;费城日本领事馆前也组织了数千名华侨,他们穿着黑衣丧服,抬着棺材举行抗日集会……争取国际同情援华的宣传在美国许多城市此起彼伏。

抗战期间,华侨界先后涌现出3000多个抗日团体,侨胞们在侨居国创办了150多家抗日报刊,通过组织集会、散发传单、演出戏剧、发表演讲、募集钱物、战地采访等形式,为动员团结抗战、揭露日军罪行奔走呼号。

与此同时,侨胞在侨居国普遍开展抵制日货,阻止战略物资敌活动。“今日买日货,无异供敌人残杀同胞之子弹……凡采买日货为虎作伴之奸商,实为民众之罪人也。”在美国纽约抵制日货的万人大会上,2000多名华侨妇女穿着棉布袜,有的干脆赤脚走在游行队伍中,号召大家不买、不穿日本制造的长筒丝袜。

华侨广泛的抵制日货成绩是显著的。以南洋为例,南洋华侨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南洋的贸易总额减少约39%。“日本既认南洋为日本的生命线,现在这个‘生命线’已被华侨的爱国心所割断。”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用自己的行动做了最好的救亡宣传。一方面,这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孤立,也让更多的人在了解中国抗战的态度和信心后,主动加入中国抗战的队伍,众多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积极倡导国内团结,竭力反对妥协投降和分裂内战,并在舆论上不断地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海外侨胞营造的国际环境和氛围是分不开的。

### 捐款捐物: 倾其所有支援抗战前线

抗战期间,约有400万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占当时华侨总人数的一半左右。正如南洋侨领陈嘉庚描绘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嗇,小贩工人也尽倾血汗。”南洋华侨郑潮炯妻子予他人,得款全部捐

给祖国抗战。缅甸华侨叶秋蓬将自己全部的家产拍卖,悉数捐给祖国后,因无以为生,出家为尼,并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无妨的。”菲律宾华侨吴清河、薛素丽将婚宴费捐出,并附信一封:“日寇猖獗,举国同愤,捐资抗战,义不容辞。我谨将自备结婚费用国币三千元汇上,以作抗战军需。”智利华侨甚至为祖国捐献了首饰、瓷器、字画及古董等物,有的华侨把自己的结婚戒指都捐给祖国用于抗战。

欧美地区的华侨亦是如此。底特律市郊华侨简夫人汇寄给纽约、旧金山等地中国劝募救国机构的钱,在105万美元以上。她表示:“只要中国不亡,我愿捐献最后一元以拯救祖国,若是不幸中国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华侨,同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在加拿大的抗战捐款活动中,一位靠打工为生的老华侨当场将囊中的1100加拿大元仅留10元作旅费,其余全部捐出,感动了在场的侨胞。两位华侨青年各自将积蓄多年的1400加拿大元捐献出来。他们说:“我们远离祖国,不能亲往杀敌,区区捐款,略尽国民的天职罢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知道国内亲属处境艰难,有意把历年省吃俭用的积蓄寄回祖国。从“七七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侨汇逐年猛增:1937年为国币4.73亿元,到1941年已高达18亿元。据资料,抗战时期侨汇浩大,总额约达国币95亿元。这些侨汇填补了国民政府大量军费开支。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光海外华侨就认购了一半。华侨购买公债较之国内同胞购债还起着特殊的作用,它可使国民政府增加大笔宝贵的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用来购买抗战急需品或国内短缺的军用物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发行了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华侨购债总额占国民政府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尤为感人的是,南洋华侨购债后,又掀起“还债”和“焚债”等销毁债券的活动,实际上是为国家无偿捐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抗战物资极度匮乏。为支持祖国抗战,广大华侨节衣缩食,踊跃捐献战争物资。大到飞机坦克汽车,小到被褥服装蚊帐,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

据资料,抗战全面爆发后5年内,广大侨胞共捐献飞机217架,极大充实了中国空军的力量。其他如美洲华侨捐救护车200辆,马来亚、缅甸华侨捐卡车计300辆,越南华侨捐装甲车多辆。温哥华侨胞还发起了“坦克车救国大运动”。为运送军用物资,南洋华侨捐献了大量的运输卡车用于滇缅公路上。

战时,药品属于紧缺物资。凡士林油膏、防疫疫苗、防毒面具、医疗器械等都有华侨捐献,非洲华侨还捐了一架当时属于先进仪器的X光机。金鸡纳霜(奎宁)是印尼特产、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据不完全统计,印尼华侨在抗战期间共捐金鸡纳霜约1.17亿粒,不知道挽救了多少前线将士和同胞的生命。

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捐物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4年抗战,华侨总共捐了多少钱,恐无法获得确切数字,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数字统计为国币13.2亿元(仅指1937—1945年)。据有关资料,战时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约为31:1。华侨所捐物资,帮助祖国克服了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温暖了抗日军民的身心,鼓舞了杀敌士气。就连蒋介石都承认:“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事关至巨。”

华侨对中共领导的抗战部队也给予了巨大支持。旅美华侨李兆焕捐资兴办了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并向抗日军政大学捐助经费。1940年百团大战胜利后,为了鼓励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英勇抗战,海外华侨鼎力捐款,其中泰国华侨陈子谷变卖家产,将所得20余万元和募集的6万元带回国内直接捐给新四军,一下子就解决了新四军三个月的军饷。叶挺军在《抗敌报》上表扬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还在一次会上说,革命胜利后我们应该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

### 投资建厂: 不计利润稳固战时后方

“七七事变”后,广大东南亚华侨的祖籍地福建、广东等地相继沦陷,日军在侨乡的恶行,激起了东南亚华侨的愤慨,他们纷纷投资国内,为抵抗日军侵略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但是,华侨投资国内尤其是大西南地区,可谓是很困难,投入巨大。尤其是当时抗战前途未卜,投资风险,农垦业,成本大,时间长,见效慢,在战乱年代难以获利也是不难想象的。

再加上日军的封锁与轰炸,投资企业还面临着被炸毁而血本无归的风险。

华侨投资祖国大后方除了爱国心的驱使,同时也离不开一些侨领的动员工作。著名的侨领陈嘉庚、胡文虎、侯西反、庄西言等都积极宣传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侨领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原拟在新加坡投资建立制药厂,但是考虑到海外捐献药品长途运回国内,既不安全,又难以保证时间,便于1941年将资金移入国内,合资创建了大型的重庆制药厂。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式提炼药厂,可生产91种军需药品,为解决前线士兵药品紧缺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马来亚华侨王振相、王金兴创办了胶轮复制厂和中南橡胶厂。胶轮复制厂在1940年开工不久就修复轮胎一万多个,不但缓解了抗战的运输问题,同时也为国家节省了2000多万元外汇。中南橡胶厂建立之后,在云南种植橡胶树,解决了胶源问题,生产出大量的军需物品,包括军鞋、车胎等,克服了我国大量依赖进口外国橡胶的问题,满足了抗战的部分需要。

这一时期,南洋华侨在祖国大后方的投资涉及糖厂、锡矿、炼油、植物油、陶瓷等多个领域。华侨的投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解决了抗战以来后方涌入人口的就业问题,缓解了战争、生活的物资紧缺状况,稳固了后方的经济。

抗战基地转移到西南大后方之后,粮食的缺乏造成粮价飞涨。为缓解此困境,国民政府开始鼓励垦殖,一时,垦殖成为华侨投资的重点。当时,泰国政府排华日甚,许多难侨组织回国垦殖团,由罗汉等10余人率领回国,到云南车里、南侨、佛海等地垦殖。如华侨创办的华西垦殖公司、广西露堂垦殖公司,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增加了粮食的产量,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和社会矛盾。

当时,华侨向国内大规模的投资绝大多数是不计利润的,纯属为祖国抗战需要,其成效也让国民党《中央日报》不得不承认:“在战时的今天,华侨投资当是抗战建国的柱石。”

与此同时,许多爱国侨胞奔赴陕甘宁边区兴办实业,成立了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开办华侨纺织厂和华侨制药厂等。延安的侨资企业大都是职工认股集资。如坐落在杜甫川的华侨毛织厂就是菲律宾华侨工人募股创办的。其他如桥儿沟化工厂、光华制药厂等都有华侨职工集资入股的情况。华侨在延安投资的效益十分显著。以延安华侨毛织厂为例,1942年建厂投产,当年即获净利50万元,该厂生产的大批毛毯、毛呢、纺毛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及边区军民的生活需要,繁荣了边区的工商业,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岁月。

### 回国参战: “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是华侨青年冲破家庭阻挠,满怀爱国热情回国参战时留下的豪迈宣言。由于华侨回国参战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所以到底有多少人投入这股洪流已无法完全统计,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战时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早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就有一支由252人组成的华侨抗日救国义勇军在浴血搏杀。他们在前线是“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在后方,“所受苦痛亦最多”。旅日华侨徐香进,偕同华侨刘兆祥等人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在为前线押送作战物资时,途遇敌机轰炸,同行者早已远避,而她始终不离职守,粉身碎骨。美国归侨黄毓莹驾飞机凌空迎击来犯敌机的日机时,不幸坠毁身亡。徐香进、黄毓莹等是为祖国抗日而壮烈献身的第一批华侨烈士,他们为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立下了首役之功。

发端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航空救国运动,在抗战时期形成第二次高潮。华侨不仅出钱培养航空技术人才,而且出钱将他们送回国内。仅美国就为国内输送了航空人才200人左右,全国开飞机飞行员中华侨占四分之三,成为中国空军的作战主力。从南洋回国抗战的华侨飞行员中,印尼的吕天龙、梁添成、陈镇和、刘盛芳等人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抗战时的稀缺人才,华侨飞行员大大提升了空中打击日军的作战能力,夺回了某些地区的制空权,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和同胞的生命。

“你们这批人回去,代表的是800万海外华侨,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这是陈嘉庚送别南侨机工(华侨司机和修理工的简称)时说的话。

“七七事变”后,中国主要港口和不少铁路线相继被日军侵占,输入外来物资主要依靠

### ● 启发妇女觉醒 解放旧礼教下的女性

女星社创办前后,天津已经出现了不少女子学校,很多女性接受了当时的“新式教育”,但她们仍然处在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命运无法自己掌握。究其根本,是因为当时社会对女性整体的看法和思想仍处于落后阶段,即使受过教育的女性也很难挣脱旧思想、旧礼教编织的网络。觉悟社成员张嗣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她身陷包办婚姻的苦恼,因生育女孩遭到夫家冷遇,甚至重病在床却无人照料,凄凉离世。

女星社提出,想要真正解放妇女,必须先打破封建思想束缚。《女星》专刊中曾谈到:“‘代办婚姻’同‘三从四德’等等,足以置妇女于死地,在包办婚姻下,女子完全做翁姑的奴隶,丈夫的玩物。”李峙山在《妇女日报》中指出:“我们女子无论站在甚么地位,总是被男子压迫,给人作奴隶。原因虽然很多,最大的却要算是因为女子经济不能独立。”邓颖超在《女星》第十期发表了《受了婆婆教训的一个同学》一文,其中呼吁道:“被剥夺婚姻权的女青年们,快冲破包办的重围,携起手来前进呀!”这些文章论述了旧礼教中男子对女子进行的“愚民政策”,认为只有打破社会对妇女们老日的看法和思想,达成社会新的认知,才能使广大妇女真正地独立起来。

### ● 革新教育路径 推动女子教育事业发展

面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局面,邓颖超深刻意识到,想要真正达成天津乃至全国范围的女子解放,必须先用知识武装女子的头脑。于是女星社积极创办女子分校,加入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及省县教育会等组织,为革新教育路径、推动女子教育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全国妇女教育事业的榜样。

在男性支配的环境下,女子教育事业很难被重视,发展非常困难。1924年,湖南教育司私自任命男子为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打破了原有的规章定例,遭到女界强烈反对。当此消息传到天津时,女星社大胆发言,在《妇女日报》上揭露当时教育界蔑视女性地位、私自践踏女性权力的丑恶行为,并积极号召社会各大妇女团体给予湖南女界支持和帮助。

此外,女星社开办的女星第一分校,教师是由女星社成员组成,她们自编教材,教学灵活,帮助失学的女性获取受教育的机会,免费教其普通的社会常识,使她们毕业时以认识更多的字,以便读懂白话文。女星社还以报社名义发文,为督促教育当局解决女师风潮而呼吁。在此过程中,女星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骨干,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看法,传播了一种较为先进的思想。

女星社深刻认识到,要想促进女子教育事业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推翻封建军阀统治,消除固有阶级压迫,摆脱老旧势力束缚。女星社成员李峙山在1924年4月8日的《妇女日报》发文称:“因此我们觉悟到:(一)今后要向现在的中国,找比较有希望的政治革命团体;(二)我们要向同阶级宣传我们已找着比较有希望的政治革命团体,及第一步合作的方法;(三)将我们的同志,由小而大地组织起来。”她认为,一点一滴地做下去,总有一天,教育状况会改良。这些都为天津以及全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 ● 借助马克思主义 号召妇女参与革命

女星社虽仅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但在中国早期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完善妇女教育、明确妇女权利之外,还借助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动员更多的妇女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为天津乃至全国妇女革命运动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1924年5月5日,《妇女日报》刊登《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六岁生日》纪念马克思,展开对马克思一生事迹的介绍,凸显其奋斗精神,并呼吁青年劳动者和青年学生:“不必学马克思

1938年8月底开通的滇缅公路。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西南运输处,负责西南地区军用物资运输和进出口货物运输,并委托陈嘉庚在南洋招募华侨回国参战。之后,陈嘉庚向南洋总会各分会发出通告,得到了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华侨青年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筛选,共有3193名华侨青年分批回国,这些是由南侨总会及其下属机构登记并安排回国的统计人数,超过原计划近6倍。

当时,南洋机工们须闯四道鬼门关:疟疾关、雨水泥路关、险路和险情关、日机轰炸关。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不计其数,行车非常艰险。如遇雨天,道路泥泞,险情大增。后来,日军向南洋进攻,经常派飞机轰炸滇缅公路。然而机工们没有退缩,反而恪尽职守,日夜不停地为祖国输送抗日物资。

因国内正面战场战事激烈,所需作战物资补给十万火急,因而南侨机工的运输任务紧急而繁重,必须限时限量,不得贻误。当时昆明至下关往返路程为824公里,限36个小时内装卸往返运完。在紧张的运输中,时常有车辆抛锚在荒无人烟的荒野中,干脆吃完只好推着肚子等车来才能讨得饭食;缺水渴极了,只好取泥浆澄清后解渴。为祖国抗战效力,他们就是这样吃苦耐劳也在所不惜。他们向海外亲人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穿行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云南沿途风物的四大特点: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

经过五四运动洪流的洗涤,我国备受压制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20世纪初,女权思想的传播、女子新学的倡导,使天津一度成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地带,涌现出不少先进的妇女组织,至今闻名的女星社即在此时诞生。

2023年恰逢女星社成立100周年。1923年年初,留在天津的觉悟社成员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妇女团体以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还曾写信给远在法国的周恩来征求意见。经认真探讨后,决定采用邓颖超的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女星社”,希望它像明亮的星星,一直照耀着天津乃至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前程。

1923年4月25日,女星社在天津正式成立,起初设在河北区中山路五昌里10号,后迁至河北区中山路达仁里10号,出版了《女星》和《妇女日报》两种刊物。女星社办社宗旨鲜明,即“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女星社的思想传播对天津妇女运动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 天津早期妇女组织 女星社的思想传播

胥钰臻 张洪伟

做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应该学马克思做一个苦战奋斗的战士。”不久,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天津后,女星社联合众多社会先进爱国团体,在天津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唱《第三国际歌》,发表《列宁的精神》演说。女星社也借助《妇女日报》发声并悼念,发表文章《谁可以继承列宁》表明观点:“应该专门研究列宁主义及其背景,要拿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的历史。”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的影响后,邓颖超等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具备了运用科学理论进行分析的能力。邓颖超深刻认识到,要把妇女解放运动同政治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于是她同女星社其他成员发动和组织天津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运动。在此过程中,她奔走呼号,多次发表演讲提出观点:“认清了吾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给他一个总攻击,从根本上谋改革,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主旨就是鼓励妇女要明确自身社会地位,认清当下社会形势,打倒封建军阀,积极投身革命建设。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不断深入,妇女参与革命的决心变得愈发强烈,逐渐成为革命斗争的生力军。在历史上著名的“五卅运动”中,邓颖超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支援上海,其人员多为天津工农妇女,规模较大。这样的革命形式,更深入地将革命斗争与反对军阀统治相结合,让妇女们从自身开始觉醒,进一步得到思想的解放与革新。

在女星社知识女性的领导下,天津妇女在五四运动中,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权利得到了本质的认可,她们也逐渐从家庭走上政治革命的舞台。

女星社作为“女性运动的火炬,巾幗前行的灯塔”,对我国妇女解放及运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百年风云过,爱国心不变。一百年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女星社的故事、女星社的思索,在今后将代代相传,熠熠生辉。(胥钰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洪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机工们共抢运了45万吨以上的物资,平均每天运回300吨,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其中仅1941年一年就运入机枪、炮弹、汽车、各种药品等达13万多种。

由于路况复杂和日本军机的轰炸,先后有1000多名南侨机工以身殉国。每1公里就有1名南侨机工献出宝贵的生命,平均死亡率每日七八人。战斗在滇缅路上的每个南侨机工都有自己光辉的一页,他们是祖国抗战的功臣。

与此同时,不少侨胞受中共抗战主张感召,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归侨有600多人,涌现出叶飞、林文虎等著名归侨将领和抗日英雄。

悠悠赤子情,拳拳报国心。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笔者不敢说如果没有华侨共赴国难,抗战胜利或许会晚几年到来,但势必会更加艰难。抗战胜利78年后的今天,面对那些滚烫的数字和无数令人感佩的事迹,我们仍能从中获得这样的启示:抗战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达到空前的团结,共御外侮,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必须团结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发挥爱国侨胞心向祖国、热爱家乡的光荣传统,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发展,共同致力于祖国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同样,只有祖国真正实现富强、民族实现振兴,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尊严才能得到根本的维护。